

栾城文集卷十七

赋

墨竹赋

与可以墨为竹，视之良竹也。客见而惊焉，曰：“今夫受命于天，赋形于地。涵濡雨露，振荡风气。春而萌芽，夏而解驰。散柯布叶，逮冬而遂。性刚洁而疏直，姿婵娟以闲媚。涉寒暑之徂变，傲冰雪之凌厉。均一气于草木，嗟壤同而性异。信物生之自然，虽造化其能使。今子研青松之煤，运脱兔之毫。睥睨墙堵，振洒缙绡。须臾而成，郁乎萧骚。曲直横斜，□纤庠高。窃造物之潜思，赋生意于崇朝。子岂诚有道者耶？”

与可听然而笑曰：“夫予之所好者道也，放乎竹矣。始予隐乎崇山之阳，庐乎修竹之林。视听漠然，无概乎予心。朝与竹乎为游，莫与竹乎为朋。饮食乎竹间，偃息乎竹阴。观竹之变也多矣。若夫风止雨霁，山空日出。猗猗其长，森乎满谷。叶如翠羽，筠如苍玉。澹乎自持，凄兮欲滴。蝉鸣鸟噪，人响寂历。忽依风而长啸，眇掩冉以终日。笋含箨而将坠，根得土而横逸。绝涧谷而蔓延，散子孙乎千忆。至若丛薄之余，斤斧所施。山石萃确，荆棘生之。蹇将抽而莫达，纷既折而

犹持。气虽伤而益壮，身已病而增奇。凄风号怒乎隙穴，飞雪凝冱乎陂池。悲众木之无赖，虽百围而莫支。犹复苍然于既寒之后，凜乎无可怜之姿。追松柏以自偶，窃仁人之所为。此则竹之所以为竹也。始也余见而悦之，今也悦之而不自知也。忽乎忘笔之在手，与纸之在前。勃然而兴，而修竹森然。虽天造之无朕，亦何以异于兹焉？”

客曰：“盖予闻之，庖丁，解牛者也，而养生者取之；轮扁，斲轮者也，而读书者与之。万物一理也，其所从为之者异尔。况夫夫子之托于斯竹也，而予以为有道者，则非耶？”与可曰：“唯唯。”

【译文】

文与可用墨画竹子，看上去确实就像真的竹子一样。客人看见他画的墨竹非常惊奇，说：“竹子接受大自然赋予的生命，在大地上生长成形。享受雨露的滋润，听凭风露的振荡。春天的时候萌生发芽，夏天的时候就挣脱笋壳、茁壮生长，逐渐把枝叶都舒展散布开来，到冬天便长成了。竹子的品性刚正纯洁而又疏离独立，姿态优美而又娴雅妩媚。经历寒暑的变迁，傲视凌厉的冰雪。和草木一样共同接受天地之气，生长在同样的土壤中，而

品性却大不相同。这确实是万物生长的自然过程，即使是老天爷，大概也指挥不了吧？如今，您研磨松烟做成的墨，挥动兔毛制成的笔，或者在墙壁上斜视作画，或者在绢帛上奋笔挥洒，用不了一会儿就把竹子画成，看上去长得茁壮茂盛，仿佛还能听到微风吹拂在枝叶上发出的响声。有的曲，有的直，有的横，有的斜；或浓密，或纤细，或矮小，或高大；形体各异，姿态横生，简直就像窃取了造物主已经想好还没有表现出来的构思，赋予竹子如在清晨一般的生意。您难道确实是已经掌握了规律的人吗？”

与可赞同地笑着说：“我所喜爱、追求的就是事物的规律，已经不局限于对竹子的具体认识了。早先，我隐居在高山向阳处，在优美的竹林里结庐而住。无论是眼睛里看到的，还是耳朵里听到的，都觉得很冷漠，一点儿也不关心。白天把竹子当成游伴，晚上把竹子当成朋友。在竹林中吃喝，在竹荫下躺倒休息。日久天长，我观察到竹子的变化实在是太多了。比如在风静雨停的时候，太阳出来，山色空明，竹子旺盛地生长，满山谷里都是繁茂的一片。竹叶就像翡翠鸟的羽毛，竹皮就像青色的美玉。那竹子淡泊恬静，独立不倚，竹叶上凝结的让人感到有一丝寒意的晶莹露珠，仿佛就要掉落下来。这时，远近没有一点儿人的声响，只听见蝉在鸣，鸟在叫。忽然风起，竹子就随风偃仰，发出悠长的啸声。辽阔的竹林，一整天都是那样东倒西歪。竹笋被包在笋壳里往外长，似乎就要掉下来的样子；而竹根只要有土，就向周围伸长。它们穿过山谷，四处蔓延，让新繁殖出来的成千成亿的子子孙孙后代散布在山野里。至于杂草丛生的边缘地带，经常会被刀斧砍伐；而满山乱石之处，则又荆棘丛生。在这种恶劣的

自然环境里，竹笋艰难地将要抽芽，而不能畅达生长；竹子被纷纷砍断，却还直立不倒。它们的元气尽管受到损害，却益发显得健壮；身体正因为有了伤残，才更增加了一种独特的魅力。凄厉的寒风在缝隙洞穴间怒号，大雪把池沼都凝固冻结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众多的树木都无可奈何，即使是百围粗的大树也经受不了，真让人觉得悲哀。而竹子却在寒冷过去之后，还能呈现出青翠的颜色，神气让人敬畏，却没有丝毫让人感到可怜的姿态。它们把自己与松柏相配、并列，效仿有仁德的人的行为。这就是竹子所以成为竹子的特殊品格。开始的时候，我看到这些觉得非常喜欢。现在，我仍然喜欢竹子的这些特殊品格，但自己却已经不觉得了。突然之间，我忘记了手里的笔和面前的纸，猛然站起来，奋笔挥洒，繁茂优美的一幅墨竹就画成了。即使是造物主化育，天衣无缝，与我的这墨竹比起来，又能有什么不同呢？”

客人说：“我听说：庖丁，只是一个宰牛剔骨的人，而注意于摄养身心的人却从中吸取了有益的经验；轮扁，只是一个砍木料制造车轮的人，而读书人却十分赞同他的意见。由此可见，万事万物的规律都是共同的，一样的，只不过是各行各业的具体做法不同罢了。况且，您把自己的精神寄托在这种高洁的竹子身上，我把您当作一位掌握了规律的人，这难道不对吗？”与可说：“对！对！”

黄楼赋（并叙）

熙宁十年秋七月乙丑，河决于澶渊，东流入钜野，北溢于济南，溢于泗。八月戊戌，水及彭城下，余兄子瞻适为彭城

守。水未至，使民具畚鍤，畜土石，积刍茭，完室隙穴，以为水备。故水至而民不恐。自戊戌至九月戊申，水及城下者二丈八尺，塞东西北门，水皆自城际山，雨昼夜不止。子瞻衣制履屨，庐于城上，调急夫、发禁卒以从事，令民不得窃出避水。以身帅之，与城存亡。故水大至而民不溃。方水之淫也，汗漫千余里，漂庐舍，败冢墓，老弱蔽川而下，壮者狂走无所得食，槁死于丘陵林木之上。子瞻使习水者浮舟楫载糗饵以济之，得脱者无数。水既涸，朝廷方塞澶渊，未暇及徐。子瞻曰：“澶渊诚塞，徐则无害。塞不塞天也，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。”乃请增筑徐城，相水之冲，以木堤捍之。水虽复至，不能以病徐也。故水既去，而民益亲。于是即城之东门为大楼焉，堊以黄土，曰：“土实胜水。”徐人相劝成之。辙方从事于宋，将登黄楼，览观山川，吊水之遗迹，乃作黄楼之赋。其辞曰：

子瞻与客游于黄楼之上，客仰而望俯而叹曰：“噫嘻！殆哉！在汉元光，河决瓠子，腾蹙钜野，衍溢淮泗，梁楚受害二十余岁。下者为污泽，上者为沮洳。民为鱼鳖，郡县无所。天子封祀太山，徜徉东方，哀民之无辜，流死不藏。使公卿负薪，以塞宣房。瓠子之歌，至今伤之。嗟惟此邦，俯仰千载。河东倾而南泄，蹈汉世之遗害。包原隰而为一，窥吾墉之摧败。吕梁龃龉，横绝乎其前，四山连属，合围乎其外。水洄洑而不进，环孤城以为海。舞鱼龙于隍壑，阅帆樯于睥睨。方飘风之迅发，震鞞鼓之惊骇。诚蚁穴之不救，分閭閻之横溃。幸冬日之既迫，水泉缩以自退。栖流楫于乔木，遗枯蚌于水裔。听澶渊之奏功，非天意吾谁赖。今我与公，冠冕裳衣，设几布筵，斗酒相属，饮酣乐作，开口而笑，夫岂偶然也哉？”

子瞻曰：“今夫安于乐者，不知乐之为乐也，必涉于害者而后知之。吾尝与子凭兹楼而四顾，览天宇之宏大。缭青山以为城，引长河而为带。平皋衍其如席，桑麻蔚乎旆旆。画阡陌之纵横，分园庐之向背。放田渔于江浦，散牛羊于烟际。清风时起，微云霏发。山川开阖，苍莽千里。东望则连山参差，与水皆驰。群石倾奔，绝流而西。百步涌波，舟楫纷披。鱼鳖颠沛，没人所嬉。声崩震雷，城堞为危。南望则戏马之台，巨佛之峰。岿乎特起，下窥城中。楼观翱翔，巍峨相重。激水既平，渺莽浮空。骈洲接浦，下与淮通。西望则山断为□，伤心极目。麦熟禾秀，离离满隰。飞鸿群往，白鸟孤没。横烟澹澹，俯见落日。北望则泗水漫，古汴入焉，汇为涛渊，蛟龙所蟠。古木蔽空，乌鸟号呼。贾客连檣，联络城隅。送夕阳之西尽，导明月之东出。金钲涌于青嶂，阴氛为之辟易。窥人寰而直上，委余彩于沙碛。激飞楹而入户，使人体寒而战栗。息汹汹于群动，听川流之荡潏。可以起舞相命，一饮千石。遗弃忧患，超然自得。且子独不见夫昔之居此者乎？前则项籍、刘戊，后则光弼、建封。战马成群，猛士成林。振臂长啸，风动云兴。朱阁青楼，舞女歌童。势穷力竭，化为虚空。山高水深，草生故墟。盖将问其遗老，既已灰灭而无余矣。故吾将与子吊古人之既逝，悯河决于畴昔。知变化之无在，付杯酒以终日。”于是众客释然而笑，颓然而就醉。河倾月堕，携扶而出。

【译文】

熙宁十年（元祐）秋天的七月十七日，黄河在澶渊一带决了口，洪水向东流入钜野，又向北漫溢到济水里，向南漫溢到泗水里。八月二十一日，洪水涌流到彭

城的城墙下。我的哥哥子瞻当时正任彭城的太守。洪水到来之前，他就让百姓置办畚箕、铁锹，储备泥土、石头，积聚干草，修治堵塞洞穴，预先作好防水准备，所以洪水到来时，老百姓并不惊吓。从八月二十一日到九月初一，在这十来天里，洪水在城墙外就高达二丈八尺。为防洪水灌进城里，他们把东、西、北三面的城门都封堵严实。城外一直到远处的山下，遍地都是水，天上还昼夜不停地下着雨。在这种紧急情况下，子瞻身上穿着裘服，脚下穿着葛制的单底鞋，就搭窝棚住守在城墙上，紧急调拨民工，动用禁兵，投入防洪抢险斗争，下令老百姓不得私自出城。他自己身先士卒，率领军民奋战，决心与城共存亡。所以，尽管洪水来势凶猛浩大，城中的百姓却并不慌乱。正当洪水泛滥的时候，方圆一千多里内都是汪洋一片。房屋被漂走了，坟墓被冲毁了，年老体弱的人躲避不及，都被淹死了，尸首浮满河道，顺着水流往下漂。年轻力壮的人发疯一般地逃跑，有的跑上山丘，有的爬到树上，但没有地方得到吃的东西，有不少都饥饿枯死了。子瞻就让会游泳的人驾着小船，载上食物去赈救，因此而活下来的人不计其数。洪水退了之后，朝廷正忙着堵塞澶州曹村的决口，根本顾不上管徐州的事。子瞻说：“澶州曹村的决口要是真能堵住，那徐州就没有灾害了。不过，能不能堵住，只能听天由命，还很难预料。但无论如何，都不能让徐州的百姓再蒙受患难了。”于是就向朝廷申请，增筑徐州的城墙。还视察水流的要冲，用木料筑起堤岸来抵御。这样，洪水即使再来，也不会危害徐州了。所以，洪水过去之后，百姓对他更亲近了。于是，子瞻就在原城墙的东门上修起一座大楼，外面粉刷了一层黄土，意思是说：“土能胜水。”

这座黄楼是徐州百姓勉励协力建成的。苏辙我当时正任应天府签判，将要应邀出席子瞻举办的重九黄楼之会，登上黄楼，浏览那里的青山河川，凭吊洪水留下的遗迹，于是就撰写了这篇《黄楼赋》。赋的内容是这样说的：

子瞻与宾客在黄楼上游览，宾客抬头远望，俯首感叹，说：“啊呀，好危险呀！在西汉的元光年间，黄河在瓠子堤决口，洪水奔腾汹涌，直到钜野，又漫溢到淮河、泗水里，给河南和鲁南、苏北造成二十多年的祸害。这一带，地势低下的地方都变成了死水潭，高处也都被水浸成湿地。百姓被淹死喂了鱼鳖，州府、县衙全被冲毁，连个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汉武帝到泰山封禅，漫步在东方的大地上，哀怜老百姓没有罪过，却被洪水漂流而死，尸体暴露在荒野上。他让随从的公卿们背着柴堵塞瓠子决口，在堤上建起了宣房宫，自己还作了两首《瓠子之歌》。武帝的《瓠子之歌》，至今读起来，还让人感伤。啊！徐州这一带，转眼间就过去一千年来。如今黄河再度泛滥，向东倾注，向南漫溢，重蹈了汉代的祸害。大水把这里的高处低处全都淹没，变成汪洋一片，眼睁睁地要使徐州的城墙崩裂败坏。吕梁洪形势凶险，横穿过徐州城前；四面的山峦连接，包围在徐州城外。洪水回旋不流，在孤零零的徐州周围形成一片大海。鱼龙在护城壕与沟壑里游舞，从城墙的豁口处往外看，只有船只在漂摆。当暴风雨来临的时候，简直像军队里敲响战鼓一样使人惊骇。当时真是只要有一点儿小漏洞不补救，整个徐州城就肯定会彻底崩溃。幸运的是临近冬天，洪水渗到地下，水势逐渐减退。大水过后，乔木上还挂着很多冲流下来的树根，无数已经枯死的蚌还遗留在岸边。听说澶州曹村的决口已经堵塞成

功，这不是凭天意又是靠什么呢？如今，我与子瞻您，穿戴整齐，摆设几案，布置筵席，举着大杯互相劝酒，开怀畅饮，演奏乐曲，笑声不绝于口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吗？”子瞻说：“如今安享欢乐的人，并不知道自己享受的是欢乐，只有经历过患难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如今的欢乐。我曾经与您一起凭靠在这座楼上向四面了望，观赏辽阔的天地景色。在想象中，把周围环绕的青山当作徐州的城墙，把淮河当作护城河。那平静的水泽展延开来，就像用苇竹编成的坐席。桑树、大麻郁郁葱葱，茂密旺盛。遍布在田野里的纵横小道，就像画出来的一样；园林屋舍或向或背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水田里钓鱼的都到了江边，牛羊都分散放牧在烟霭迷茫的远处。清爽的凉风不时刮来，淡淡的云雾密集在天空。山峦河川时而清晰可辨，时而被云雾笼罩，千里之内，苍莽一片。向东望去，山峦连接，高低不平，仿佛与河水一样在飞奔。无数的山石倾泄奔腾，就像横渡河流而向西滚来。百步洪上汹涌的波涛，把船只冲击得纷纷散开。鱼鳖都显得狼狈困顿，而潜水的人却把它当作游戏玩耍的绝好所在。惊涛发出的声音就像天上炸开的响雷，震得城墙似乎都要倒塌下来。向南望去，只见戏马台与巨佛峰，孤零零地高耸地那里，低头窥视着徐州城。城中楼观雄伟，叠叠层层；飞檐横空，就像群鸟展翅回翔在空中。激荡的河水平缓之后，水面开阔，远近都变成一片空明。那罗列相连的沙洲一直延伸到江边，与淮河相通。向西望去，山峦中断，就像环形玉器上的一个缺口，让人不忍心极目远望。小麦已经成熟，粟子正在开花，在低湿地里长得满满都是，十分繁茂。鸿雁成

群结队地飞过去，白鸟却孤单地出没。一抹淡淡的烟云横亘在那里，从楼上低头就可以看见落日。向北望去，只见泗水宽阔旷远，再加上古汴河的水又流入其中，使得泗水波涛汹涌，深不可测，成为蛟龙盘曲蛰伏的好去处。那一带古树林遮蔽了天空，可以听到乌鸦和各种鸟类呼号鸣叫。商客的船一只连着一只，直排到城墙下。把夕阳送到西边落下，又引导明月从东方升起。那红日就像金钲一样涌入青翠的峰峦，使阴冷之气惊慌地退去。明月偷看着人间一直高高地升起，把它的余辉留在浅水中的沙石里。月光穿过楹柱照入室内，让人感到寒冷而浑身战栗。夜深人静，万籁俱寂，只有川流涌荡的声音还可以听到。这时，我们便翩翩起舞，开怀痛饮，忘掉一切忧患，摆脱各种俗念，而感到自我满足。况且，您莫非没有看见从前住在这里的人吗？前边的有项籍、刘戊，后边的有光弼、建封。他们战马成群，猛士如林，振臂一呼，就能做到风起云涌。他们住在雕梁画栋的楼阁里，看舞女美妙的舞姿，听歌童悦耳的歌声。但到头来却都势穷力尽，化为一片虚空。山依然高，水依然深，那废墟上却已是杂草丛生。就连想问一问了解从前情况的老人也没法做到，因为连这些人也都早已灰飞烟灭、没有留存的了。所以，我将与您一起，凭吊已经逝去的古人，烦恼变成往昔的洪灾。知道天地间变化无所不在，既无须替古人耽忧，也不必为往昔悲哀，而只用开怀畅饮来度过我们这喜庆的时光。”听了子瞻的一席话，于是众宾客都愉悦地笑了起来，喝得颓靡疲倦，酩酊大醉。直到银河西倾、月亮都落了，这才相互搀扶着走出来。

栾城文集卷十九

论

新论上

古之君子，因天下之治，以安其成功；因天下之乱，以济其所不足。不诬治以为乱，不援乱以为治。援乱以为治，是愚其君也；诬治以为乱，是胁其君也。愚君胁君，是君子之所不忍而世俗之所徼幸也。故莫若言天下之诚势。请言当今之势。

当今天下之事，治而不至于安，乱而不至于危，纪纲粗立而不举，无急变而有缓病，此天下之所共知而不可欺者也。然而世之言事者，为大则曰无乱，为异则曰有变。以为无乱，则可以无所复为；以为有变，则其势常至于更制。是二者皆非今世之忠言至计也。

今世之弊，患在欲治天下而不立为治之地。夫有意于为治而无其地，譬犹欲耕而无其田，欲贾而无其财，虽有锄耨车马、精心强力，而无所施之。故古之圣人将治天下，常先为其所无有而补其所不足，使天下凡可以无患而后倘佯翱翔，惟其所欲为而无所不可。此所谓为治之地也。为治之地既立，然后从其所有而施之。植之以禾而生禾，播之以菽而生菽，

艺之以松柏梧楸，丛莽朴楸，无不盛茂而如意。是故施之以仁义，动之以礼乐，安而受之而为王；齐之以刑法，作之以信义，安而受之而为霸；督之以勤俭，厉之以勇力，安而受之而为强国。其下有其地而无以施之，而犹得以安存。最下者，抱其所有俛俛然无地而施之，抚左而右动，镇前而后起，不得以安全而救患之不给。故夫王霸之略，富强之利，是为治之具而非为治之地也。有其地而无其具，其弊不过于无功；有其具而无其地，吾不知其所以用之。

昔之君子，惟其才之不同，故其成功不齐。然其能有立于世，未始不先为其地也。古者伏羲、神农、黄帝既有天下，则建其父子，立其君臣，正其夫妇，联其兄弟，殖之五种，服牛乘马，作为宫室、衣服、器械，以利天下。天下之人，生有以养，死有以葬，欢乐有以相爱，哀戚有以相吊，而后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之道得行于其间。凡今世之所谓长幼之节、生养之道者，是上古为治之地也。至于尧舜三代之君，皆因其所阙而时补之。故尧命羲和历日月以授民时，舜命禹平水土以定民居，命益驱鸟兽以安民生，命弃播百谷以济民饥。三代之间，治其井田沟洫步亩之法、比閭族党州乡之制。夫家卒乘车马之数，

冠昏丧祭之节，岁时交会之礼，养生除害之术，所以利安其人者，凡皆已定而后施其圣人之德。是故施之而无所龃齟。举今《周官》三百六十人之所治者，皆其所以为治之地，而圣人之德不与也。故周之衰也，其《诗》曰：“虽无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”由此言之，幽、厉之际天下乱矣，而文、武之法犹在也。文、武之法犹在，而天下不免于乱，则幽、厉之所以施之者不仁也。施之者不仁而遗法尚在，故天下虽乱而不至于遂亡。及其甚也，法度大坏，欲为治者，无容足之地，泛泛乎如乘舟无楫而浮乎江湖，幸而无振风之忧，则悠然唯水之所漂，东西南北非吾心也；不幸而遇风，则覆没而不能止。故三季之极，乘之以暴君，加之以虐政，则天下涂地而莫之救。然世之贤人，起于乱亡之中，将以治其国家，亦必于此焉先之。齐桓用管仲，辨四民之业，连五家之兵，卒伍整于里，军旅整于郊。相地而衰征，山林川泽各致其时，陵阜陆壟各均其宜，邑乡县属各立其正，举齐国之地，如画一之可数。于是北伐山戎，南伐楚，九合诸侯，存邢卫，定鲁之社稷，西尊周室，施义天下，天下称伯。晋文反国，属其百官，赋职任功，轻关易道，通商宽农，懋穡劝分，省财足用，利器明德，举善援能，政平民阜，财用不匮。然后入定襄王，救宋卫，大败荆人于城濮，追齐桓之烈，天下称之曰二伯。其后子产用之于郑，大夫种用之于越，商鞅用之于秦，诸葛孔明用之于蜀，王猛用之于苻坚，而其国皆以富强。是数人者，虽其所施之不同，而其所以为地者一也。夫惟其所以为地者一也，故其国皆以安存。惟其所施之不同，故王霸之不齐，长短之不一。是二者，不可不察也。

当今之世，无惑乎天下之不跻于大

治，而亦不陷于大乱也。祖宗之法具存而不举，百姓之患略备而未极，贤人君子不知尤其地之不立，而罪其所施之不当；种之不生，而不知其无容种之地也。是亦大惑而已矣。且夫其不跻于大治与不陷于大乱，是在治乱之间也。徘徊彷徨于治乱之间而不能自立，虽授之以贤才，无所为用。不幸而加之以不肖，天下遂败而不可治。故曰：莫若先立其地；其地立，而天下定矣。

【译文】

古代正直的士大夫，既顺应国家的政治稳定而安享它的成就，也根据国家混乱动荡的状况，采取措施，补救它的不足。既不把“治”诬蔑为“乱”，也不把“乱”附会为“治”。把“乱”附会为“治”，这是在欺骗皇帝；把“治”诬蔑成“乱”，这是在要挟皇帝。欺骗皇帝和要挟皇帝，这是正人君子所不忍干的事情，而世俗小人却常常通过这种方式来达到非分的企图。所以，最好不过的是讲出国家当前的真实形势。请允许我讲当今的国家大势。

目前国家的情况，说是治平吧，却未达到安稳的程度；说是混乱吧，还不至于立即就有危险；各种法制都已粗略地建立起来，但却未能执行；国家不会很快就有什麼急剧的变故，但却正在缓慢地发生着病变。这些是天下的人都知道的，谁也骗不了。但是，国家的那些负有言责的士大夫们，有的只追求表面、笼统，就说“没有乱子”；有的追求标新立异，就说“有变故”。以为“没有乱子”，那就意味着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；而以为“有变故”，那趋势就往往意味着要改变国家的制度。这两种意见，对国家当前的形势来说，都不是诚实的言论和最好的策略。

如今国家的弊病，在于主观上想治理国家却不去确立治理国家的基础。想治理国家却没有基础，就像是想耕种却没有田地，想作买卖却没有资金。这样，即使是有锄□等农具和车马等运输工具，并且专心致志、身强力壮，也没有地方发挥作用。所以，古代的帝王将要治理国家，常常是先从没有的事情上做起，同时把不足的方面弥补起来，从而使天下的人都可以无忧无虑，自由自在地往来，想干什么都可以；这就是所谓治理国家的基础。治国的基础既已确立，然后就依据自己所有的东西逐一施行。这样，种上粟可以长粟，种上豆可以得豆，种植松树、柏树、梧桐、楸木，或者是莽竹、朴槲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会长得茂盛强壮，遂心如意。在这样的基础上，如果能用仁义教化人，用礼乐规范人，治理国家的人就可以安享其成而为帝王。如果是用刑政法律限制人们的行为，用诚实忠义振作人们的精神，那么，治理国家的人就可以安享其成而为霸主。如果是用勤劳俭朴督促人，用勇敢强壮磨砺人，结果就会成为强大的国家。比上面这些次一等，如果是只确立了基础没有什么别的措施办法，那国家还是可以安然存在的。最次一等的是，手里有一些措施办法，却心中迷茫，没有地方去施行。安抚左边的，右边的又动了；压下前边，后边又起来了。结果，根本得不到安全，连救助祸患都忙不过来。因此，称帝王、作霸主的策略，有利于富足强盛的措施，这些都是治理国家的工具而不是治理国家的基础。有了基础而没工具，它的弊病不过是建不了功业；而如果是仅有工具却没有基础，那我就不知道他的工具究竟该如何使用了。

古代治理国家的人，只因为他们各自的才能不同，所以他们取得的成就也就不

一样。但是，他们所以都能够有所建树，未尝不是因为首先确立治国的基础。远古时代的伏羲、神农、黄帝，他们取得天下之后，就为父子、君臣、夫妇、兄弟之间的关系确立了一整套原则。播种各种粮食作物，用牛载重，用马代步，还建造房屋，制做衣服和各种器具，以便利人民。天下的人，活的时候有食物及其他各种物品可以维持生活，死了也有棺木等可以埋葬；欢乐时有相爱的对象，悲哀时也有人慰问。这之后，伏羲、神农、黄帝他们的那些策略才有可能在人们中间实行。凡是现在人们所说的长幼之间的礼节，子女必须赡养老人的制度，这些都是上古时代治理国家的基础。至于尧、舜以及夏、商、周三代的帝王，他们也都是首先针对基础方面短缺的东西，随时加以弥补。所以，尧命令羲和根据日月运行的规律定出四时节令，传授给百姓，以便不违农时。舜命令大禹治理水土，以便使百姓有一个安定的居住环境；命令益驱逐鸷禽猛兽，以便使百姓的生命不受危害；命令弃播种各种粮食作物，以便使百姓免受饥饿之苦。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时候，还曾规定了井田、沟洫、步亩等农业生产方面的法则，建立了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等一整套地方基层组织，澄清了全国男女人口、军队和车马的数量，制定了冠礼祭祀、婚丧嫁娶的法度和逢年过节交往聚会的礼仪，教给百姓有利健康、免除灾害的办法。总之，凡是有利于百姓生活安定的各种制度都已确立，然后才以圣人高尚的思想品德来教育人，因而百姓感到非常自然，没有任何不融洽的地方。周代总共三百六十种官吏所管理的事情，都是属于治理国家的基础范围之内的事情，而圣人高尚思想品德教育还不其中。所以，到周代衰落的时候，《诗经》上说：“虽然没有了德

高望重的老臣，但那足以垂范后世的法度依然留存。”由此可见，周幽王、周厉王的时候，天下是大乱了，但周文王、周武王时代制定的法度还是存在的。他们制定的法度还存在，而天下却不能避免出现混乱局面，这说明周幽王、周厉王所实行的政策太残暴了。不过，尽管他们实行暴政，因为文王、武王的法度还存在，所以国家虽然出现了混乱局面，却还不至于马上就灭亡。及至后来情况更加严重，文王、武王的法度遭到彻底破坏，想治理国家的人就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了。他们就像坐在船上却没有桨，飘飘忽忽地浮在江湖上，如果运气好，不碰上大风，那就只能任凭江水漂荡，至于东西南北，究竟会往哪个方向漂，就不能随自己的主观愿望了。万一不幸而碰上大风，那就肯定要翻船沉没，无法制止。所以，到了夏、商、周三代的末期，暴君统治，实行暴政，天下的百姓就如陷入泥淖之中，再也无法拯救了。然而，世上的一些有德行、有才能的人，他们在国家混乱衰亡的时候兴起，准备治理他们的国家，也必定是首先在确立治国基础上下功夫。齐桓公任用管仲，所做的事情就是把士、农、工、商各行各业分开，使他们各得其所，又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军事编制。这样，从都城到郊野的地方，就都有了军容整齐的武装力量。又根据地力的肥瘠进行征税，这样，就使得从山林川泽到高原丘陵，都既不失农时，又负担合理，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发展。在此基础上，又划分了国都之外的各级行政区域，并一一确立了主管行政的官员。结果，整个齐国的土地就变得整齐一律，简直都可以数出来了。经过整顿，国力强大了，他们就向北进攻山戎，向南攻打楚国，九次会合天下的诸侯，出力挽救了邢、卫两个小国的危亡，帮助稳定了鲁国

的混乱局面，到西面对周天子表示尊崇，又在天下普施道义，因而天下各国诸侯都称齐桓公为霸主。晋文公返回晋国之后，会见所有的官僚，任用有功的人，授给他们职权，减轻关税，除灭盗贼，使道路畅通，搞活商业，减轻农民负担，鼓励农耕，奖励富有的人分财物救济贫乏，节省财物，满足国用，器具便利，道德昌明，举荐道德高尚的人，提拔才能出众的人。因而政治清明，人民富足，国家也变得财力雄厚。在此基础上，晋文公又扶定襄王作为周天子，援救了被攻打了的宋、卫两个国家，在著名的城濮之战中，彻底战败强大的楚国，建立的功业足以与齐桓公相比。所以，天下的诸侯就把他称为继齐桓公之后的第二个霸主。后来，子产把这种办法用在郑国，文种把这种办法用在越国，商鞅把这种办法用在秦国，诸葛孔明把这种办法用在蜀汉，王猛把这种办法用在苻坚的前秦，结果，他们的国家都因此而得以富强。以上这些人，尽管他们具体的做法有所不同，但他们在首先确立治理国家的基础这一点上却是完全相同的。正因为他们都是首先确立治理国家的基础，所以他们的国家才得以安然存在；也正因为他们的具体做法不一致，有高低优劣的区别，所以才有的为王，有的称霸，有的统治时间长，有的却时间短。这两个方面，切不可不加区别，混为一谈。

对于国家当前的状况，决不可糊里糊涂地沾沾自喜，以为尽管没达到大治的程度，但也还没陷于大混乱的境地。祖宗的法度都存在，但却未能真正执行。老百姓的祸患，各种各样，大体都有了，只是还没有发展到极点罢了。官僚士大夫们不知道责怪治理国家的纪纲、法度没有确立，却只是一味地指责某些具体措施不当。作物的种子不能生芽成长，却不知道是因

为没有用来播种的地方。这也实在是太糊涂了。况且，国家既没达到大治也没陷于大乱，这本身就说明正处在治乱之间。本来已经处于治与乱两者之间，却还迷惘徘徊，不能有所自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即使

是有贤能的人出来，也无法施展才能。而假使万一不幸，让不贤的人执掌大权，那么，国家就要败亡而不可救药了。所以我说：最好是先确立治理国家的基础；治国的基础一旦确立，那天下就会安定了。

栾城文集卷二十一

书

上皇帝书

熙宁二年三月日，具位臣苏辙谨冒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：

臣官至疏贱，朝廷之事非所得言。然窃自惟，虽其势不当进言，至于报国之义，犹有可得言者。昔仁宗亲策直言之士，臣以不识忌讳得罪于有司。仁宗哀其狂愚，力排群议，使臣得不遂弃于世。臣之感激，思有以报，为日久矣。今者，陛下以圣德临御天下，将大有为以济斯世。而臣材力弩下，无以自效，窃听之道路，得其一二，思致之左右。苟惩创前事，不复以闻，则其思报之诚，没世而不能自达，是以辄发其狂言而不知止。

臣闻善为国者，必有先后之次。自其所当先者为之，则其后必举；自其所当后者为之，则先后并废。《书》曰：“欲登高，必自下。欲陟遐，必自迩。”世未有不自下而能高，不自近而能远者。然世之人常鄙其下而厌其近，务先从事于高远，不知其不可得也。《诗》曰：“无田甫田，维莠骄骄。无思远人，劳心忉忉。”以为田甫田而力不给，则田□而不治，不若不田也。思远人而德不足，则心劳而无获

不若不思也。欲田甫田，则必自其小者始。小者之有余，而甫田可启矣。欲来远人，则必自其近者始，近者之既服，而远人自至矣。苟由其道，其势可以自得。苟不由其道，虽强求而不获也。臣愚不肖，盖尝试妄论今世先后之宜，而窃观陛下设施之万一。以为所当先者，失在于不为；而所当后者，失在于太早。然臣非敢以信然也，特其所见有近于是者，是以因其近似而为陛下深言之。

伏惟陛下即位以来，躬亲庶政，聪明睿智，博达宏辩，文足以经治，武足以制断，重之以勤劳，加之以恭俭，凡古之帝王，旷世而不能有一焉者，陛下一旦兼而有之矣。夫以天纵之姿，济之以求治之心，施之于事，宜无为而不成，无欲而不遂。今也为国历年于兹，则治不加进，天下之弊日益于前世。天下之人未知所以适治之路，灾变横生，川原震裂，江河涌沸，人民流离，灾火继作，历月移时，而其变不止。此臣所以日夜思念而不晓，疑其先后之次，有所未得者也。

夫今世之患，莫急于无财而已。财者为国之命，而万事之本。国之所以存亡，事之所以成败，常必由之。昔赵充国论备边之计，以为湟中谷斛八钱，余三百万斛，羌人不敢动矣。诸葛亮用兵如神，而

以粮道不继，屡出无功。由是观之，苟无其财，虽有圣贤，不能自致于跬步。苟有其财，虽庸人可以一日而千里。陛下顷以西夏不臣，赫然发愤，建用兵之策，招来横山之民，将夺其险阻，破坏其国而后已。方是之时，夏人残虐失众，横山之民厌苦思汉，而又乘其荐饥，苟加之以兵，此非计之失者也。然而沿边无数月之粮，关中无终岁之储，而所兴之役，有莫大之费。陛下方且泰然，不以为忧，以为万举而有万全之功。既而边臣失律，先事轻发，亦既入践其国，系虏其民矣。然而陛下得其地而不敢收，获其人而不敢臣，虽有成功，而不敢继也，其终卒致于废黜谋臣而讲和好。夫陛下谋之于期年之前而罢之于既发之后，岂以为是失当而悔之哉？诚无财以缮其后尔。且夫财之不足，是为国之先务也。至于鞭笞四夷，臣服异类，是极治之余功，而太平之粉饰也。然今且先之，此臣所以知其先后之次有所未得者也。今者陛下愆前事之失，出秘府之财，徙内郡之租赋，督转漕之吏，使备沿边三岁之畜。臣以此疑陛下之有意乎财矣，然犹以为未也。何者？秘府之财，不可多取，而内郡之民，不可重困。可以纾目前之患，而未可以为长久之计。此臣所以求效其区区而不能自己也。盖善为国者不然，知财之最急而万物赖焉。故常使财胜其事而事不胜财，然后财不可尽而事无不济。财者车马也，事者其所载物也。载物者常使马轻其车，车轻其物。马有余力，车有余量，然后可以涉涂泥而车不僨，登坂险而马不蹶。今也四方之财，莫不尽取，民力屈矣，而上用不足。平居惴惴，仅能以自完，而事变之生，复不可料。譬如敝车羸马，而引丘山之载。幸而无虞，犹恐不能胜；不幸而有阴雨之变，陵谷之险。其患必有不可知者。故臣深思极虑，

以为方今之计，莫如丰财。然臣所谓丰财者，非求财而益之也，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。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，虽求财而益之，财愈不足。使事之害财者尽去，虽不求丰财，然而求财之不丰，亦不可得也。故臣谨为陛下言事之害财者三：一曰冗吏，二曰冗兵，三曰冗费。

冗吏之说曰：请原古之所以置吏之意。有是民也，而后有是官；有是官也，而后有是吏；量民而置官，量官而求吏，其本凡以为民而已；是以古者即其官以取人，郡县之职缺而取之于民，府寺之属缺而取之于郡县，出以为守令，入以为卿相。出入相受，中外相贯，一人去之，一人补之，其势不容有冗食之吏。近世以来，取人不由其官，士之来者无穷，而官有限极。于是兼守判知之法生，而官法始坏，浸淫分散，不复其旧。是以吏多于上，而士多于下，上下相窒。譬如决水于不流之泽，前者未尽，来者已至填咽充满，一陷于其中而不能出。故布衣之士多方以求官，已仕之吏多方以求进，下慕其上，后慕其前，不愧诈伪，不耻争奋，礼义消亡，风俗败坏，势之穷极，遂至于此。夫人情纾则乐易，乐易则有所不为；窘则慙乱，慙乱则无所不至。今使众人相与皆出于隘，足履相蹶，肩肘相逮，傍徨而不得进，又将禁其奔走而争先者。苟将禁之，则莫如止来者而辟其隘。今也驱市人而纳之，不胜其多也，设险于中涂而限难之，是以法愈设，而争愈甚。惟陛下以时救之，下哀痛之书，明告天下，以更多之故，与之更立三法。其一，使进士诸科增年而后举，其额不增，累举多者无推恩。其说曰：凡今之所以至于不可胜数者，以其取之多也。古之人其择吏也甚精，人知吏之不可以妄求，故不敢轻为士，为士者皆其修洁之人也。今世之取

人，诵文书，习程课，未有不可为吏者也。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，是以群起而趋之。凡今农工商贾之家，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。为士者日多，然而天下益以不治。举今世所谓居家不事生产，仰不养父母，俯不恤妻子，浮游四方，侵扰州县，造作诽谤者，农工商贾不与也。祖宗之世，士之多少，其比于今不能一二也。然其削平僭乱，创制立法，功业卓然见于后世，今世之士，不敢望其万一也。士之多不及于今世，而功则过之，无足怪者，取之至少，则人不敢轻为士。其所取者，皆州郡之选人也。故为是法，使人知上意之所向，十年之后，无实之士将不黜而自灭。且夫设科以待天下之士，盖将使其才者得之，不才者不可得也，吾则取之而彼则不能得，犹曰虽不能得而累举多者，必取无弃，则是以官徇人也。且累举之士，类非少年矣，耳目昏塞，筋力疲倦，而后得之，数日而计之，知其不能有所及也，则其为政无所赖矣。今有人畜牛羊而求牧，既取其壮者，又取其老者。取其壮者曰：“吾取其力也。”取其老者曰：“吾怜其老也。”如怜其老而已，则曷为以累牛羊哉？苟诚以为有遗才焉，则今所谓遗逸之书，有以收之矣。其二，使官至于任子者，任其子之为后者，世世禄仕于朝，袭簪绶而守祭祀，可以无憾矣。然而为是法也，则必始于二府。法行于贱而屈于贵，天下将不服。天下不服，而求法之行，不可得也。盖矫失以救患者，必有所过而后济。臣非不知二府之不可以齿庶官也。其三，使百司各损其职掌，而多其出职之岁月。其说曰：百司，臣不得而尽详也，请言其尤甚者莫如三司。三司之吏，世以为多而不可损。何也？国计重而簿书众也。臣以为不然。主大计者，必执简以御繁，以简自处，而以繁寄人。以简自处，则心

不可乱；心不可乱，则利至而必知，害至而必察。以繁寄人，则事有所分；事有所分，则毫末不遗，而情伪必见。今则不然，举四海之大，而一毫之用必会于三司，故三司者案牍之委也。案牍既积，则吏不得不多。案牍积而吏多，则欺之者众，虽有大利害，不能察也。夫天下之财，下自郡县而至于转运，转相钩较，足以为不失矣。然世常以转运使为不可独信，故必至于三司而后已。夫苟转运使之不可独信而必三司之可任，则三司未有不责成于吏者，岂三司之吏则重于转运使欤？故臣以为天下之财，其详可分于转运使，而使三司岁揽其纲目，既使之得优游以治财货之源，又可颇损其吏，以绝乱法之弊。苟三司犹可损也，而百司可见矣。然而此三法者，皆世之所谓拂世戾俗、召怨而速谤者也。今且将行之，臣非敢犯众人之怒而行此危事也，以为有可行之道焉。何者？自台省六品、诸司五品，一郊而任一人，自两制以上，一岁而任一人，此祖宗百年之法，相承而不变者也，而仁宗之世则损之；三载而考绩，无罪者迁其官，自唐以来，亦未始有变者也，而英宗之世则增之。此二者，夫岂便于世俗哉？然而莫敢怨者，以为吏多而欲损者，天下之公义，其不欲者，天下之私计也。以私计而怨公义，其为怨也不直矣。是以善为国者，循理而不恤怨；非不恤怨，知其无能为也。且今此三法者，固未尝行也，然而天下亦不免于怨。何者？士之出身为吏者，捐其生业，弃其田里，以尽力于王事。而今也以吏多之故，积劳者久而不得迁，去官者久而不得调，又多为条约以沮格之，减罢其举官，破坏其考第，使之穷窘无聊，求进而不遂。此其为怨，岂减于布衣之士哉？均之二怨，皆将不免。然使新进之士日益多，国力匱竭而不能支，

十年之后，其患必有不可胜言者。故臣愿陛下亲断而力行之。苟日增之吏渐于衰少，则臣又将何以治其旧吏。使诸道职司，每岁终任其所部，郡守监郡各任其属。曰自今以前，未有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，二者皆自上钩其轻重而裁之，已而以他事发，则与之同罪，虽去官与赦不降也。夫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，其为恶也著矣，而上不察，则上之不明亦可知矣，故虽与之同罪而不过。今世之法，任人者任其终身，苟其有罪，终身钩坐之。夫任人之终身，任其未然之不可知者也；任人之岁终而无过，任其已然之可知者也。臣请得以较之：任其未然之不可知，虽圣人有所不能。任其已然之可知，虽众人能之。今也任之以圣人之所不能，既不敢辞矣，而况任之以众人之所能，顾不可哉？且按察之吏，则亦不患其不知也，患其知而未必皆按，曰：“是无损于我，而徒以为怨云尔。”今使其罪及之，其势将无所不问。陛下诚能择奉公疾恶之臣而使行之，陛下厉精而察之，去民之患如除腹心之疾，则其以私罪至某、赃罪正入已至若干者，非复过误，适陷于深文者也。苟遂放归，终身不齿，使奸吏有所怨，则冗吏之弊可去矣。

冗兵之说曰：臣闻国朝创业之初，四方割据，中国地狭，兵革至少。其后荡灭诸国，拓地既广，兵亦随众。雍熙之间，天下之兵仅三十万。方此之时，屯戍征讨，百役并作，而兵力不屈，未尝有兵少之患也。自咸平、景德以来，契丹内侵，继迁叛逆，每有警急，将帅不问得失，辄请益兵。于是招募日增，而兵额之多，遂倍前世。其后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元昊窃发，复使诸道点民为兵，而沿边所屯至七八十万，自是天下遂以百万为额。虽复近岁无事，而关中之兵，至于二十八万。举

雍熙天下之众，适以备方今关中一隅之用，兵多之甚，于此见矣。然臣闻方今宿边之兵，分隶堡障，战兵统于将帅者其实无几。每一见贼，贼兵常多，我兵常少，众寡不敌，每战辄败。往者将帅失利，未有不以此自解者也。夫祖宗之兵至少，而常若有余；今世之兵至多，而常患于不足。此二者不可不察也。兵法有之曰：兴师十万，出征千里。百姓之费，公家之奉，日费千金，内外骚动，怠于道路者，七十万家。而爱爵禄百金，不能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。故三军之事，莫亲于间，赏莫重于间。间者，三军之司命也。臣窃惟祖宗用兵，至于以少为多，而今世用兵至于以多为少，得失之原，皆出于此。何以言之？臣闻太祖用李汉超、马仁瑀、韩令坤、贺惟忠、何继筠等五人使备契丹，用郭进、宋琪、李谦溥、李继勋等四人使备河东，用赵赞、姚内斌、董遵诲、王彦升、冯继业等五人使备西羌，皆厚之以关市之征，饶之以金帛之赐，其家属之在京师者，仰给于县官，贸易之在道路者，不问其商税。故此十四人者皆富厚有余，其视弃财如弃粪土，□人之急如恐不及。是以死力之士，贪其金钱，捐躯命，冒患难，深入敌国，刺其阴计而效之。至于饮食动静无不毕见，每有入寇辄先知之。故其所备者寡而兵力不分，敌之至者举皆无得而有丧。是以当此之时，备边之兵多者不过万人，少者五六千人。以天下之大，而三十万兵足为之用。今则不然，一钱以上，皆籍于三司，有敢擅用，谓之自盗。而所谓公使钱，多者不过数千缗。百须在焉，而监司又伺其出入而绳之以法。至于用间，则曰“官给茶縵”。夫百饼之茶，数束之縵，其不足以易人之死也明矣。是以今之为间者，皆不足恃；听传闻之言，采疑似之事，其行不过于出

境，而所问不过于熟户。苟有借口以欺其将帅则止矣，非有能知敌之至情者也。敌之至情，既不可得而知，故常多屯兵以备不意之患。以百万之众而常患于不足，由此故也。陛下何不权其轻重而计其利害？夫关市之征，比于茶綵则多；而三十万人之奉，比于百万则约。众人知目前之害，而不知岁月之病。平居不忍弃关市之征以与人，至于百万则恬而不知怪。昔太祖起于布衣，百战以定天下，军旅之事其思之也详，其计之也熟矣。故臣愿陛下复修其成法，择任将帅，而厚之以财，使多养间谍之士，以为耳目。耳目既明，虽有强敌而不敢辄近，则虽雍熙之兵，可以足用于今世。陛下诚重难之，臣请陈其可减之实。何者？今世之强兵，莫如沿边之土人。而今世之情兵，莫如内郡之禁旅。其名愈高，其廩愈厚。其廩愈厚，其材愈薄。往者，西边用兵，禁军不堪其役，死者不可胜计。羌人每出，闻多禁军，辄举手相贺；闻多土兵，辄相戒不敢轻犯。以实较之，土兵一人，其材力足以当禁军三人。禁军一人，其廩给足以贍土兵三人。使禁军万人在边，其用不能当三千人，而常耗三万人之畜。边郡之储比于内郡，其价不啻数倍。以此权之，则土兵可益，而禁军可捐，虽三尺童子知其无疑也。陛下诚听臣之谋，臣请使禁军之在内郡者，勿复以戍边。因其老死与亡，而勿复补，使足以为内郡之备而止。去之以渐，而行之以十年，而冗兵之弊可去矣。

冗费之说曰：世之冗费，不可胜计也。请言其大与臣之所知者，而陛下以类推之。臣闻事有所必至，恩有所必穷。事至而后谋，则害于事；恩穷而后迁，则伤于恩。昔者太祖、太宗，敦睦九族，以先天下。方此之时，宗室之众无几也，是以合族于京师，久而不别。世历五圣，而太

平百年矣，宗室之盛未有过于此时者也。祿廩之费多于百官，而子孙之众宫室不能受。无亲疏之差，无贵贱之等，自生齿以上皆养于县官，长而爵之，嫁娶丧葬无不仰给于上，日引月长，未有知其所止者。此亦事之所必至，而恩之所必穷者也。然而未闻所以谋而迁之。古者天子七庙，三昭三穆，与太祖而七。以人子之爱其亲，推而上之，至于其祖，由祖而上，至于百世，宜无所不爱。无所不爱，则宜无所不庙。苟推其无穷之心，则百世之祖，皆庙而后为称也。圣人知其不可，故为之制，七世之外，非有功德则迭毁，春秋之祭不与。莫贵于天子，莫尊于天子之祖，而庙不加于七，何者？恩之所不能及也。何独至于宗室而不然？臣闻三代之间，公族有以亲未绝而列于庶人者。两汉之法，帝之子为王，王之庶子犹有为侯者，自侯以降，则庶子无复爵土。盖有去而为民者，有自为民而复仕于朝者，至唐亦然。故臣以为，凡今宗室，宜以亲疏贵贱为差，以次出之，使得从仕比于异姓，择其可用而试之以渐。凡其禄秩之数、迁叙之等、黜陟之制、任子之令，与异姓均。临之以按察，持之以寮吏，威之以刑禁，以时察之，使其不才者不至于害民，其贤者有以自效。而其不任为吏者则出之于近郡，官为庐舍而廩给之，使得占田治生，与士庶比。今聚而养之，厚之以不訾之禄，尊之以莫贵之爵，使其贤者老死郁郁而无所施，不贤者居处隘陋，戚戚而无以为乐，甚非计之得也。昔唐武德之初，封从昆弟子，自胜衣以上皆爵郡王。太宗即位，疑其不便，以问大臣，封德彝曰：“爵命崇则力役多，以天下为私奉，非至公之法也。”于是疏属王者降为公。夫自王而为公，非人情之所乐也，而犹且行之。今使之爵禄如故而获治民，虽有内外之异，宜

无有怨者。然臣观朝廷之议，未尝敢有及此。何者？以宗室之亲，而布之于四方，惧其启奸人之心、而生意外之变也。臣窃以为不然。古之帝王，好疑而多防，虽父子兄弟不得尺寸之柄，幽囚禁锢，齿于匹夫者，莫如秦、魏。然秦、魏皆数世而亡。其所以亡者，刘氏、项氏与司马氏，而非其宗室也。故为国者，苟失其道，虽胡越之人皆得谋之。苟无其衅，虽宗室谁敢觊者？惟陛下荡然与之无疑，使得以次居外，如汉、唐之故。此亦去冗费之一端也。臣闻汉、唐以来，重兵分于四方，虽有未大之忧，而馈运之劳不至于太甚。祖宗受命，惩其大患而略其细故，敛重兵而聚之京师。根本既强，天下承望而服。然而转漕之费，遂倍于古。凡今东南之米，每岁溯汴而上，以石计者，至五六百万。山林之木尽于舟楫，州郡之卒散于道路，月廩岁给之奉不可胜计。往返数千里，饥寒困迫，每每侵盗，杂以他物，米之至京师者率非完物矣。由此观之，今世之法，直以其力致之而不计其患，非法之良者也。臣愿更为之法，举今每岁所运之数而四分之。其二即用旧法，官出船与兵而漕之，凡皆如旧。其一募六道之富人，使其船及人漕之，而所过免其商税。能以若干至京师，而无所欺盗败失者，以今三司军大将之赏与之。方今滨江之民以其船为官运者，不求官直，盖取官之所入而不复较者得其赢以自润。而富民之欲仕者，往往求为军大将。以此推之，宜有应募者。其一官自置场，而买之京师。京师之兵，当得米而不愿者，计其直以钱偿之。夫物有常数，取之于南，则不足于北，舍之于东，则有余于西，此数之必然而不可逃者也。今官欲买之，其始不免于贵。贵甚，则东南之民倾而赴之，赴之者众，则将反于贱。致贱必以贵，致贵必以贱，此亦必

然之数也。故臣愿为此二者与旧法皆立，试其利害而较其可否，必将有可用者。然后举而从之，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。臣闻富国有道，无所不恤者，富之端也。不足恤者，贫之源也。从其可恤而收之，无所不收，则其所存者广矣。从其无足恤而弃之，无所不弃，则其所亡者多矣。然而世人之议者则不然。以为天下之富，而顾区区之用，此有司之职，而非帝王之事也。此说之行于天下，数百年于兹矣，故天下之费，其可已者常多于旧。臣不敢远引前世，请言近岁之事。自嘉□以来，圣人迭兴，而天下之吏，京秩以上，再迁其官，天下郡守职司，再补其亲戚。自治平京师之大水，与去岁河朔之大震，百役并作，国有至急之费，而郊祀之赏不废于百官。自横山用兵，供亿之未定，与京西流民劳徕之未息，官私之困，日不暇给，而宗室之丧不俟岁月而葬。臣以此观之，知朝廷有无足恤之义。臣诚知事之既往无可为者，然苟自今从其可恤而收之，则无益之费犹可渐减。此又去冗费之一端也。

臣不胜拳拳私忧过计，为是三冗之说以献。伏惟陛下思深谋远，听断详尽，于天下之事无所不瞩，臣之所陈，何足言者？然臣愚以为，苟三冗未去，要之十年之后，天下将益衰耗，难以复治。陛下何不讲求其原而定其方略，择任贤俊而授之以成法，使皆久于其官而后责其成绩。方今天下之官，泛泛乎皆有欲去不久之心，侍从之臣逾年而不得代，则皇皇而不乐。今虽不能使之尽久，然至于诸道之职司，三司之官吏，沿边之将佐，此皆与天子共成事者也。天下之事，将责成之而不久其任，开其源者不见其流，发其谋者不见其成功，此事之所以不得成也。陛下诚择人而用之，使与二府皆久于其官，人知不得苟免而思长久之计，君臣同心，上下协

力，磨之以岁月，如此而三冗之弊乃可去也。然而为此犹有所患。何者？今世之士大夫，好同而恶异，疾成而喜败。事苟不出于己，小有齟齬不合，则群起而噪之。借如今使按察之官任其属吏，岁终而无过，此其势必将无所不按，得罪者必将多于其旧。然则天下之口，纷然非之矣。不幸而有一不当，众将群指以罪，法一不当不能动，不幸而至于再三，虽上之人亦将不免于惑。众人非之于下，而朝廷疑之于上，攻之者众，而持之者不坚，则法从此败矣。盖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杀人者，或者因以耕田为可废。夫杀人之可诛与耕田之不可废，此二事也。安得以彼而害此哉？故夫按人而不以其实者，罪之可也，而法之是非，则不在此。苟陛下诚以为可行，必先能破天下之浮议，使良法不废于中道。如此而后，三冗之弊可去也。

三冗既去，天下之财得以日生而无害，百姓充足，府库盈溢，陛下所为而无不成，所欲而无不如意。举天下之从，惟所用之，以攻则取，以守则固，虽有西戎北狄不臣之国，宥之则为汉文帝，不宥则为唐太宗，伸缩进退，无不在我。今陛下不事其本，而先举其末，此臣所以大惑也。臣不胜愤懑，越次言事，雷霆之谴，无所逃避。臣辙诚惶诚恐，顿首顿首，谨书。

【译文】

熙宁二年（~~元祐~~）三月日，臣下苏辙谨冒万死，再拜向皇帝陛下上书：

臣下我的官职最为低贱，朝廷上的事情本来没有我的发言权。但臣下我暗自思忖，尽管就形势而论不该由我来向朝廷进言，但从报效国家的大义来看，臣下我还是可以发言的。从前，仁宗皇帝亲自策试敢于直言的士子，臣下我袒诚直言，不避

忌讳，结果得罪了考官。仁宗皇帝哀怜臣下的狂妄愚忠，力排众议，选取了臣下，才使臣下我得以免于被世抛弃。臣下我出于感激之情，总想着要有所报答。这样的心情已经存在了好长时间了。如今，皇帝陛下以至圣之德统御国家，必将大有作为，以振救天下。而臣下我的材力迟钝低下，没有能力报效。但从道听途说之中，约略知道一些情况，很想将它们上达给皇帝陛下。臣下我觉得，如果因为从前直言无忌而受到创伤，如今便缄口不言，不再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让皇帝陛下知道，那么，臣下我思念报效国家的一片赤诚便永远也不会上达于朝廷了。因此，臣下我还是无法克制，愿意再讲一番狂妄的话。

臣下我听说，善于治理国家的人，办事必然有一个先后的次序。如果从应当先办的事情做起，那么，该后办的事情就会一一办成；如果是先做了本该后办的事情，那就所有的事情都不会办成了。《尚书》说：“要想登高必须从最低处开始，要想走远必须从最近处开始。”世界上从未有过不从低处开始而能登到高处，也从未有过不从近处开始而能到达远方的。然而，世上的人却常常鄙薄低处和厌弃近处，总是先着手于高处和远处，不懂得这样做的结果，那高处和远处是根本不能达到的。《诗经》说：“不要耕种大面积的田地，莠草会遍地都是。不要思念远方的人，结果只会忧心忡忡。”这里的意思是说，耕种大面积的田地而力量达不到，结果田地荒芜，还不如不耕种；思念远方的人来依附而自己的德行不足，结果空废心思而一无所获，还不如原本就不思念的好。如果想耕种大面积的田地，就必须先从小面积开始，耕种小面积的田地有余力，而后才可耕种大面积的田地；如果想让远方的人来依附你，就必须先从近处的